

## 劳动史的意义:史学多视角考察的聚焦

王子今

**摘要** 中国史学传统多专注于记述上层社会生活,尤其偏重政治史现象。然而,司马迁早年有“耕牧”经历,他在《史记》中对于“劳”这种生产和生活现象多有关注,甚至对先古圣王行政之“劳勤”也有所表扬。这种史学观察方式,后世史籍亦间或有所继承。史学史研究者应当注意这些情形。劳动、劳作与劳苦生活,是社会文化的惯常面貌,也是历史过往的连续镜像。聚焦政治史、经济史和生活史对相关现象的记录、考察、理解和说明,或许可以看作史学研究不可忽略的视角。劳动阶级的苦难,曾经被视为政治危机与社会动荡的因由,并往往因此引致民众暴动。背离总结农民战争史与王朝兴替的公式化、简单化的解说,以自然灾变、行政过失和战争危难为背景具体考察社会较宽广层面的劳苦生活,对于历史真实的认识,应当是有重要意义的。

**关键词** 史学;视角;劳动;劳作;劳苦;社会生活

**中图分类号** K23;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5)03-0122-11

**基金项目**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G1924)

往往关注社会上层的生活,通常以政治史现象作为记述重心,是中国史学长期形成的传统。这与视政治为文化焦点,以政治为文化高端,将政治史表现作为历史最重要主题的思维惯性有关<sup>[1]</sup>。然而有些清醒的史学家关注到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的底层现象及其对历史走向与历史节奏的作用。司马迁早年有“耕牧”经历<sup>[2]</sup>(P3293),《史记》中对于“劳”这种生产和生活现象多有关注,甚至对于先古圣王行政之“劳勤”也有所表扬<sup>①</sup>。这种史学观察方式,后世史籍编纂亦间或有所继承。史学史研究者应当注意这些情形。史家记录所见劳动、劳作与劳苦生活现象是社会文化的惯常面貌,也是历史过往的连续镜像。聚焦政治演进、经济发育、文化与生活的变化,记录、考察、理解和说明相关现象,或许可以看作史学研究不可忽略的视角。劳动阶级经历苦难,曾经被视为政治危机与社会动荡的直接因由,并往往由此导致民众暴动。背离总结农民战争史俗套之公式化、简单化的解说,以自然灾变、行政过失和战争危难为背景具体考察社会较宽广层面的劳苦生活,对于历史真实的认识,应当是有重要意义的。为多种华丽文化形式所包装的历史内质,其实每一页都浸透了劳苦民众的汗渍、血迹和泪痕。读史与述史,应当就此有所认识,有所理解,有所说明。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念充分重视劳动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意义。恩格斯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

①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轩辕)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sup>[2]</sup>(P9)张守节《正义》引《大戴礼》云:“宰我问于孔子曰:‘民予闻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材物,生而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sup>[2]</sup>(P9)《史记》卷二《夏本纪》说,“(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sup>[2]</sup>(P51)《史记》卷三《股本纪》:“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sup>[2]</sup>(P97)《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所谓“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周公勤劳王家”;《史记》卷三七《卫康公世家》“(卫文公)身自劳,与百姓同苦”等,也是相同的宣传<sup>[2]</sup>(P1518,1523,1595)。《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与百姓同其劳”的说法,与表扬卫文公语相同,然而也是首先承认“百姓”之“劳”的<sup>[2]</sup>(P1742)。

人类史初始的标志，“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同时又贯穿历史的全程，“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他还指出，“劳动本身经过一代又一代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sup>[3]</sup>（P988, 994, 1000, 995）。对中国古代相关历史迹象的考察研究，无疑有益于考察“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演进，“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的劳动史，从而真切了解历史进程的全景。

## 一、“用力者劳”与社会“劳苦”现象

“劳”是一种生理体验，也是一种心理感觉，在历史进程中是惯常现象。史籍亦片段保留了相关记忆。史家又往往借用这种人的身体现象，与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相联系，阐发相关史论。如果仅仅就社会人，主要是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考察有关“劳”的史学记述，也是有意义的。

“劳”本义是指用力激烈的重体力劳作以及所导致的身心疲顿。《说文·力部》：“劳，勩也。从力炎省，焱火烧𠂔。用力者劳。”段玉裁注：“勩各本从刀、作劇。今订从力。《文选》《北征赋》注引《说文》：‘劇，甚也。’恐是许书本作‘勩，用力甚也’，后因以为凡甚之词。又讹其字从刀耳。”又说：“焱旧作炎。今正。此析炎字而释之。烧𠂔，谓烧屋也。斯时用力者最劳矣。或改𠂔作门者，误。”指出“烧屋”火情发生时扑救者“用力”“最劳”。段玉裁注：“务者，趣也。用力尤甚者。”《说文·力部》随后又言：“勩，尤勩也。”段玉裁注：“勩，大徐作极，小徐作勩。今正。勩又勩之尤者也。勩者以力制胜之谓，故其事为尤劳。”<sup>[4]</sup>（P700）大约以“用力甚”解释“劳”，是正确的。与“劳，勩也”的解说对应，史籍有“劳剧”的说法<sup>[5]</sup>（P1006）。或说“勤劳”“苦剧”<sup>[6]</sup>（P2337），都是对下层民众艰辛劳作的描述。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述秦穆公请戎王使者由余参观宫室积聚。由余感叹：“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sup>[2]</sup>（P192）指出秦文化传统之所谓“秦之好兴事”<sup>[2]</sup>（P1408），可以导致社会的“劳”“苦”。《史记》卷三七《卫康公世家》“（卫文公）身自劳，与百姓同苦”，《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与百姓同其劳”，都是注意到“百姓”之“劳”“苦”的。《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言“百姓之劳”<sup>[2]</sup>（P1806）。而《史记》卷九七《酈生陆贾列传》所谓“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sup>[2]</sup>（P2697），虽然是颂扬“天子”德政的言辞，却也曲折反映了“百姓新劳苦”的普遍的历史真实。《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陛下以淮南民贫苦，遣使者赐长帛五千匹，以赐吏卒劳苦者。”<sup>[2]</sup>（P3078）同时说到“民贫苦”“吏卒劳苦”，也值得我们注意。“卒”的身份，本来就在社会底层。

## 二、“劳”的近义表述：“罢”“疲”

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底层民众不能不“为劳力事”<sup>[2]</sup>（P2812）。司马迁曾经总结社会阶层因财富形成的等级差异：“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sup>[2]</sup>（P3274）所谓“役”“仆”的关系，即必然致使“为劳力事”。在阶级压迫成为常态的制度下，劳动者承担了生产与生活的沉重压力。后世于是有这样的社会分析：“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sup>[7]</sup>（P4738）所谓“坐待衣食之人”，当然包括脑力劳动者，但是“劳苦之人”“为劳力事”，以艰苦的物质生产支撑着中华社会的基本结构，维护着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推进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进步，这一情形，是历史学者应当予以特殊关注的。

史籍文献中“劳”的近义表达，或用“罢”“疲”字。《说文》中以“劳也”解释的字，可见《广部》：“疲，劳也。”《心部》：“憊，劳也。”<sup>[4]</sup>（P507）《力部》：“敕，劳也。”“勩，劳也。”“勩，劳也。”“劬，劳也。”“勤，劳也。”<sup>[4]</sup>（P699-700）而段玉裁的解说，又可见“贤，劳也”，“羸，劳也”<sup>[4]</sup>（P279），“瘁，劳也”，“疸，劳也”<sup>[4]</sup>（P351），“肩，劳也”<sup>[4]</sup>（P400），“忉忉，忧劳也”<sup>[4]</sup>（P512）等。可知劳作者身体辛苦感受，有多种表现。《说文·广部》：“疲，劳也。”段玉裁注：“经传多假‘罢’为之。”<sup>[4]</sup>（P352）《说文·网部》：“罢，遣有罪也。从网能。网，罪网也。”段玉裁注：“《周礼》有‘罢民’。郑曰：‘民不愆作劳，有似于罢。’《齐语》有‘罢士’‘罢女’，韦曰：‘罢，

病也。’无作曰病。按‘罢民’、‘罢士’谓偷惰之人。罢之音亦读如疲,而与疲义殊。《少仪》:‘师役曰罢。郑曰:罢之言疲劳也。’凡曰之言者,皆转其义之词。”<sup>[4]</sup>(P356)

又《说文·疒部》:“瘡,疲也。”段玉裁注引录“骨节疼也”的解说。而《说文·疒部》:“癰,罢病也。”段玉裁注:“病,当作癰。罢者,废置之意。凡废置不能事事曰罢癰。”“然则凡废疾皆得谓之罢癰也。师古注《汉书》改罢病作疲病,非许意。”<sup>[4]</sup>(P352)这些涉及人体生理学的意见,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罢”“疲”字义及其与“劳”的关联。

司马迁在《史记》卷三〇《平准书》中记载了汉武帝时代汉帝国在西南方向动势积极而又出现一些反复的进取:“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sup>[2]</sup>(P1420,1421)“巴蜀之民罢”的直接因由之一,应当是“千里负担馈粮”劳作。《史记》关于“西南夷”方向开拓之所谓“开路西南夷”“通西南夷道”<sup>[2]</sup>(P2949,2995,3046),又称“通西南夷”<sup>[2]</sup>(P2950,3048,3166),“事西南夷”<sup>[2]</sup>(P3166),或称“击”“西南夷”<sup>[2]</sup>(P2940)、“诛西南夷”<sup>[2]</sup>(P2997),“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sup>[2]</sup>(P2995)。这些记述方式,都体现了司马迁本人对当时西南夷战略的理解。其重心,一是交通建设,一是军事控制。《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记载:“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sup>[2]</sup>(P2995)这都说明了“巴蜀之民罢焉”以及“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记述的沉重民众负担之形成。“罢”字重复使用,体现所导致社会问题的严重。

汉武帝时,唐蒙以“郎中”或说“郎中郎”的身份受命前往西南夷地区,提供行政建议,也组织“治道”工程<sup>[2]</sup>(P3044,2994,3839,2994)。司马相如亦以“郎”的身份前往巴蜀。“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显然,司马相如之行,有考察调研并进行适当政策调整的责任。后来,“相如还报”,又提供了新的交通开发信息<sup>[2]</sup>(P3044-3046)。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承担的任务,应当也包括实地考察。

汉武帝的西南夷经营出现反复。于“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之后,“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汉武帝予以重视,“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sup>[2]</sup>(P2995)。当然,公孙弘的职级比唐蒙、司马相如、司马迁高。但他们都是汉武帝信用的近臣。

这位史称“雄才大略”<sup>[8]</sup>(P212)的帝王在自己不熟悉的地理条件艰险、民族构成复杂的地方任用亲近官员反复考察的方式,以及对民众“罢”的境遇予以认真关注的态度,都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sup>[9]</sup>。

### 三、劳动、劳作、劳苦生活的历史记述

《史记》记录了一些历史名人早年的贫困生活,也包括劳作经历。比如吕后虽出身富有,但出嫁后仍参与田间劳动。《史记》记载,刘邦当亭长的时候,“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sup>[2]</sup>(P346)。“两子”,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这一情节在《汉书》里也有记录,但只说“吕后及二子居田中”<sup>[8]</sup>(P5),未言及“耨”这一劳动细节。《论衡·骨相》也说到这个故事,然而言刘邦“与吕后及两子居田”。有学者指出,“居田者无高祖也”,“此处‘与’字盖衍”<sup>[10]</sup>(P83)。

若干社会下层民众“劳”“苦”生活的故事亦见于史籍。汉文帝窦皇后富贵之前,她的弟弟窦少君被拐卖,曾经历极端苦难的劳动生活。“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sup>[2]</sup>(P1973)卫青少时曾“牧羊”<sup>[2]</sup>(P2922)。曾经有“牧羊”经历的名人还有楚怀王心、路温舒、翟酺、王象等<sup>[2]</sup>(P300)<sup>[5]</sup>(P2367)<sup>[11]</sup>(P663)。又公孙弘“家贫,牧豕海上”,“卜式试于刍牧”<sup>[2]</sup>(P2949,2964)。一说卜式曾“田牧”<sup>[8]</sup>(P2625),



可能则类同于司马迁少时体验的“耕牧”劳作。任安曾经“少孤贫困，为人将车”<sup>[21]</sup>(P2779)，朱买臣曾经“常艾薪樵，卖以给食”<sup>[8]</sup>(P2791)，也都曾经从事下层民众的劳作。

秦二世曾经对李斯说，“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其言夏禹传说，“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sup>[2]</sup>(P2553)。这里作为颂扬“禹”的功绩的参照，言“臣虏之劳”之所谓“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甚至“遂以死于外”，或许就是帝王理解的下层劳动者的通常生活景况。

徭役征发是百姓“劳苦”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基传》所谓“事役劳苦”<sup>[11]</sup>(P751)。《史记》卷二四《乐书》：“征乱则哀，其事勤。”张守节《正义》：“徵音乱，其声哀苦，由徭役不休，其民事勤劳也。”<sup>[2]</sup>(P1181, 1183)这种造成民众“劳苦”境遇的“役”的征发，又被称作“劳役”<sup>[2]</sup>(P284)。《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久劳于外，为与小人……”裴骃《集解》：“马融曰：‘武丁为太子时，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劳役于外，与小人从事，知小人艰难劳苦也。’郑玄曰：‘为父小乙将师役于外也。’”<sup>[2]</sup>(P1520, 1521)也说到“久劳”“行役”之“劳役”。因“役”导致的“小人艰难劳苦”，写满了许多王朝行政史的页面。

#### 四、行政史的教训：“天下苦其劳”

社会承受“劳苦”的程度，是开明的执政者确定管理方针时必须认真考虑的。汉并天下之初，“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于是对南越国的割据表现，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故释佗弗诛”<sup>[2]</sup>(P2967)。所谓“中国劳苦”，《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作“中国劳极”<sup>[2]</sup>(P3086)。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指出，汉初，经济得以恢复，国家有了基本的财政积累，而汉武帝于是加快了积极进取的步伐。“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玩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sup>[2]</sup>(P1421)司马迁分析了汉武帝时代四个方向的进取趋势与社会影响：1. 东瓯、两越方向，导致“江淮之间萧然烦费”；2. 西南夷方向，导致“巴蜀之民罢焉”；3. 朝鲜方向，导致“燕齐之间靡然发动”；4. 北边方向，导致“天下苦其劳”。

另一段文字也指出了几个方向的军事扩张导致了财政危机和社会苦难，且“自山东咸被其劳”：“……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樊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sup>[2]</sup>(P1421-1422)这里只说到了三个方向，河南地、朔方；西南夷；沧海之郡；最后又说到“朔方”。没有涉及东瓯、两越方向。读这段文字，依然可以理解为导致“自山东咸被其劳”的，与前说致“天下苦其劳”者相同，还是“朔方”面对匈奴军事集团的军备竞赛与战争攻防<sup>[12]</sup>。

我们讨论在汉代最强盛时段汉武帝时代的军事、行政与民生时出现了最严重的反差，即国家疆域扩张、政治发展的另一面，是社会遭受沉重的“劳”“苦”压力，“天下苦其劳”，“自山东咸被其劳”。后世评议当时形势，指出民众“劳”“苦”之外，又致使生存权丧失，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sup>[8]</sup>(P233, 1427)。

贾谊《过秦论》称秦时负担甚重的民众为“劳民”<sup>[2]</sup>(P283)。其实，开明的执政者已经逐步意识到，“民不劳苦”，是仁政推行，社会和谐的表现<sup>[2]</sup>(P422)。与此相关的政治智慧，其实在先秦时代已经见于史籍记载。据《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关于吴军攻楚的时机择定，孙武说：“民劳，未可，待之。”<sup>[2]</sup>(P1466)同一史事，《史记》卷六六《伍子胥列传》作：“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sup>[2]</sup>(P2175)体现出清醒的政治家关注“民”是否“劳”的战略思考。在司马迁笔下，有关“劳民”“民劳”政治思虑的记载，又

见于《史记》卷四〇《楚世家》、《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等篇章<sup>[2]</sup>(P1371, 2267, 2269, 3049)。

当然,执政者不可能真正认真考虑“民劳”主题。透视阶级社会政治权力的行使,必然导致“民劳”。《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子路问政,孔子曰:‘先之,劳之。’”裴驷《集解》引孔安国曰:“先导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后劳之。《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sup>[2]</sup>(P2191)行政原则即“使民”“劳之”,同时要让“民忘其劳”。这是政权性质使然。

所谓“天下苦其劳”“自山东咸被其劳”,是说战争要求的军需物资运输导致的社会压力非常沉重。这是战事发生通常都会引起的财政困窘与社会苦难。所谓“数战则民劳”<sup>[2]</sup>(P2267),就体现了这样的情形。而战争所直接造成前线军士与参与壮丁承受的“劳”“苦”,即所谓“兵劳”<sup>[2]</sup>(P2336),“敝兵劳众”<sup>[2]</sup>(P2282),“士卒劳倦”<sup>[2]</sup>(P2982),“众劳卒罢,其实难用”<sup>[2]</sup>(P2618)等记录,也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刘邦诏令:“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sup>[8]</sup>(P33)也考虑到民众“给军事”之“劳苦”。类同史事记述,又如《旧五代史》卷一九《周书·世宗纪》:“知用兵之频并,悯黎民之劳苦,盖有意于康济矣。”<sup>[13]</sup>(P1586)以及《宋史》卷三三四《范仲淹传》“民远输劳苦”<sup>[14]</sup>(P10270),《金史》卷一一一《纥石烈牙吾塔传》“边民久劳苦”<sup>[15]</sup>(P2457),《元史》卷五《世祖纪二》“以军兴人民劳苦,敕停公私逋毋征”<sup>[16]</sup>(P81),《明史》卷一五三《陈瑄传》“岁运粮用军十二万人,频年劳苦”,《明史》卷一七二《罗亨信传》“塞上诸军,防边劳苦”<sup>[17]</sup>(P4209, 4581),也都体现了对于“用兵”导致“黎民之劳苦”的认识。以往对于劳苦生活史的关注,往往与王朝衰亡的政治史总结相联系,形成一种近于公式化的解说。

多有学者以为王朝兴亡盛衰的规律,称作“周期率”者<sup>[18][19]</sup>,体现为新建王朝之“轻徭薄赋”,劳动者得到休养生息的基本条件。而王朝末年,则劳苦群众不堪其负担,形成反抗极权统治的民众暴动。这样的认识,其实起源甚早。《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sup>[2]</sup>(P271)。秦王朝崩溃之前,执政集团中已经有人认识到“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与“盗贼益多”的直接关系。

史家或从社会文化视角考察这种“戍漕转作事苦”的沉重负担,也会有精神层面的表现。如《史记》卷二四《乐书》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声音”之中,“角为民,征为事”,“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勤;……”张守节《正义》:“角音乱,其声忧愁,由政虐民怨故也。”“征音乱,其声哀苦,由繇役不休,其民事勤劳也。”<sup>[2]</sup>(P1181)

然而,以往有关王朝更替、帝祚终始、皇权交接时期的史论、政论及多种民间舆论形式,可能对相关时段有关民间“劳”的艰苦承受程度有所夸大。其沉重性及短暂性与秩序崩溃、社会动荡、改朝换代的政治史演变的关联,有可能导致承平时代社会“劳苦”负担并不严重的误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被看作历史发展动力的观念,曾经得到学界比较一致的认同。这样的认识也不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王朝初建及王朝上升期间民间“劳苦”程度的客观判断。

## 五、行政操作合理性追求与劳作成本预算

汉并天下,新政权集团对于秦短促而亡的教训有所警惕。刘邦请陆贾总结秦覆灭的教训,“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陆贾可能是第一位全面总结秦史教训的史学家。他论“成败”“存亡”,首先“著秦所以失天下”。他说秦“任刑法”,不“行仁义”<sup>[2]</sup>(P2699),应当会直接对“秦役戍多”<sup>[2]</sup>(P1950)有所批评。“役戍”征发至于极端,即时人所谓“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sup>[2]</sup>(P2573)。贾山则言:“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sup>[8]</sup>(P2332)所谓“千八百国之民”“力罢不能胜其役”,明确指出“役”的沉重,使得整个社会的民众“力罢不能胜”。

汉初行政就此有明显的扭转。都城长安的修筑,据《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汉惠帝)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孝惠元年(前194),“始作长安城西北方”。三年(前192)“初作长安城”<sup>[21]</sup>(P398,1122)。《汉书》卷二《惠帝纪》记载:“(元年)春正月,城长安。”“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九月,长安城成。”<sup>[8]</sup>(P89-91)工役调发和工期限定都非常有节制。春季施工“三十日罢”,应当有不误农时的考虑。

对于帝陵工程,汉文帝曾经宣布“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临终诏令又明确要求“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据《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记载,霸陵复土工程只动用了三万一千人<sup>①</sup>,与秦始皇陵复土工程使用工役达七十万人左右的情形比较<sup>[20]</sup>,悬殊分明。对于宫苑工程成本预算,汉文帝有著名的“露台”故事。《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写道:“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sup>[21]</sup>(P433)在汉文帝节俭表现中,“露台”成为醒目的文化符号。所谓“文帝爱百金于露台”<sup>[5]</sup>(P1604),所谓“太宗露台之意”<sup>[5]</sup>(P1783),历代传诵。《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太宗承高祖之业,惠吕息役之后,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费而辍露台,历代垂美,为不朽之迹。”<sup>[21]</sup>(P2663)《宋书》卷一〇《顺帝纪》:“露台息构,义光汉德。”<sup>[6]</sup>(P193)《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汉文)惜中人十家之产,不为露台。”<sup>[22]</sup>(P518)《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sup>[23]</sup>(P35)《旧唐书》卷七三《薛收传》:“秦帝增阿房之饰,汉后罢露台之费,故汉祚延而秦祸速,自古如此。”<sup>[23]</sup>(P2588)可见汉文帝“露台”牵涉工程史和劳役史,已经成为象征“汉德”的一个“不朽”的标志性纪念。汉文帝“起露台”的成本核算,即所谓“召匠计之,直百金”,似只是指经费预算直接以金钱计。所谓“百金之费”“十家之产”的顾虑,收到千百年来赞扬。而劳动成本,可能“匠计”考虑在内,也可能并没有“计”入。因为从“役”的“卒”“徒”,劳动是不以“金”“计”的。然而“露台”故事强调了工程发起时的“计”,已经是非常重要的进步了。

帝舜称赞禹的成就与执政能力,有对“能成水土功”的肯定<sup>[21]</sup>(P80)。而“土功”后来成为更通行的用语。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题为《土忌》的内容,说到“为土攻”(一〇四正壹),“兴土攻”(一〇六正),“起土攻”(一三一背),整理小组释文作“土攻(功)”<sup>[24]</sup>(P196,225)。刘乐贤指出,这段文字体现“土微”禁忌,“这是一个以天干记日的凶煞,其日不可为土攻”。“土微”是一个与动土有关的凶煞,其得名之由来尚待进一步考证。”<sup>[25]</sup>(P139)《史记》卷二七《天官书》三说“土功”<sup>[21]</sup>(P1316,1335,1337),以为与天象对应的国之大事。关于“秦灭梁”事,《史记》卷三九《晋世家》写道:“梁伯好土功,治城沟,民力罢,怨,其众数相惊,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灭之。”<sup>[21]</sup>(P1655)“土功”致使“民力罢,怨”,终竟亡国。此国君“好土功”,以及“土功过制”<sup>[8]</sup>(P1434),“土功非时兴”<sup>[5]</sup>(P3337),都可能导致社会灾难。

“土功”的启动和管理,有确定的行政部门负责。《续汉书·百官志一》“司空”条记载:“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sup>[5]</sup>(P3561)“土功”有工程量计算的方式。《汉书》卷五九《张汤传》说,“(张汤)调茂陵尉,治方中。”颜师古注:“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汤主治之。’苏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讳之,故言方中,或言斥土。’如淳曰:‘《汉注》陵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二丈。’”颜师古认为:“苏说非也。古谓掘地为阡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筑作算程课者,犹以方计之,非谓避讳也。”<sup>[8]</sup>(P3637-3638)颜师古所谓“土功筑作算程课”,可能就是《续汉志》“水土功课”的“土功课”。今天土木工程量的测算,仍然使用“土方”的说法。

《九章算术·商功》有可能属于“土功筑作算程课”的内容。如其中可见关于“土功”的算题:“今有塹,上广一丈六尺三寸,下广一丈,深六尺三寸,袤一十三丈二尺一寸。问:积几何? 答曰:一万九百四十三尺八寸。夏程人功八百七十一尺,并出土功五分之一,砂砾水石之功作太半,定功二百三十二尺一十五分尺

①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sup>[21]</sup>(P434)



之四。问:用徒几何? 答曰:四十七人三千四百八十四分人之四百九。”<sup>[26]</sup>(P175-177)此前一题言“沟”的挖掘,上文又有筑“城”“垣”“隄”的工程量测计的算题。“程”是劳动定额。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可见“作务员程”(二九叁),整理小组注释:“作务,《墨子·非儒下》:‘惰于作务。’《汉书·尹赏传》:‘无市籍商贩作务。’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云:‘作务,作业工技之流。’即从事于手工业。”“员程,见《汉书·尹翁归传》等。《淮南子·说山》作员呈。”《秦律十八种》中有《工人程》,整理小组注释:“人程,即员程。《汉书·尹翁归传》:‘责以员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辄答督。’注:‘员,数也,计其人及日数为功程。’杨树达《汉书窥管》卷八:‘员程为定数之程课,如每日斫莖若干石之类。’”“工人程,关于官营手工业生产定额的法律规定。”<sup>[24]</sup>(P170, 43, 171, 45)现在看来,据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周寿昌说“作务,作业工技之流”,以为“即从事于手工业”的判断,可能是不准确的。“作业”所指劳作内容要宽泛一些。如《汉书》卷七六《尹翁归传》“豪强有论罪,输掌畜官,使斫莖,责以员程”<sup>[8]</sup>(P3208),杨树达言“每日斫莖若干石之类”,就显然并非“从事于手工业”。又有关于“盘池”施工的算题:“今有盘池,上广六丈,袤八丈;下广四丈,袤六丈;深二丈。问:积几何? 答曰:七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尺太半尺。负土往来七十步;其二十步上下棚除,棚除二当平道五;踟蹰之间十加一;载输之间三十步,定一返一百四十步。土笼积一尺六寸;秋程人功行五十九里半。问:人到积[尺]及用徒各几何? 答曰:人到二百四尺。用徒三百四十六人一百五十三分人之六十二。”<sup>[26]</sup>(P186-187)

所谓“用徒”,应是说徭役劳作组织形式。注明“秋程”“夏程”的区别,又有“冬程”,是根据日出日落季节变化分别规定了劳动定额。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的《工人程》就有这样的内容:“隶臣、下吏、城旦与工从事者冬作,为矢程,赋之三日而当夏二日。工人程”(一〇八)。整理小组注释:“矢,《尔雅·释詁》:‘弛也。’矢程,放宽生产的规定标准。”整理小组译文:“隶臣、下吏、城旦和工匠在一起生产的,在冬季劳动时,得放宽其标准,三天收取相当夏季两天的产品。”<sup>[24]</sup>(P45)“程”的概念,在战国秦汉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已经广泛通行。秦始皇处理公文自设定额,史称“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裴骃《集解》:“石百二十斤。”张守节《正义》:“衡,秤衡也。言表笺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sup>[2]</sup>(P258)“日夜有呈”,就是“日夜有程期”。

“土功筑作算程课”是数学史问题,也是工程史问题,涉及政府工程,则是行政史问题。相关内容体现的智慧,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之一。

## 六、“汗”的史诗:劳动史回顾的文化意义

通常的情况下,“汗”是辛苦劳作的身体表现。《史记》卷三九《晋世家》记述,晋文公重耳流亡时始终追随的壶叔,在晋文公回国执政之后赏赐亲近功臣时有所抱怨。晋文公在进行说明时谈道:“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其中说到根据功劳“受上赏”“受次赏”“复受次赏”,又“复受次赏”的等级差异。所谓“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是“以力事我”,即为效忠君主付出艰辛的表现<sup>[2]</sup>(P1633)。《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记述了关于汉初刘邦“论功行封”,而同时出现“争功”现象的情形。“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酈侯,所食邑多。”于是引起普遍的不满。“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于是有“猎狗”“猎人”的比喻:“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sup>[2]</sup>(P2015)这里,“汗马之劳”是诸将自以为“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其“功”在“上”的依据,然而刘邦则以为“汗马之劳”只相当于“复受次赏”的等级。公孙弘病重,上书请求辞职。《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述了他如下一段话:“今臣弘罢弩之质,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素有负薪之病,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sup>[2]</sup>(P2952)这里所谓“汗马之劳”,也被看作“擢”“封”的基本条件。与“汗马之劳”语义相近,司马迁笔下又有所谓“马汗之力”。《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原国家争锋。“当楚威王时,越北伐齐”,面对越国的威胁,齐威王使人说越王,希望越军“转攻楚”,建议策动韩国和魏国合力攻楚:“……二晋之

事越也，不至于覆军杀将，马汗之力不效。”又说：“王所待于晋者，非有马汗之力也，又非可与合军连和也，将待之以分楚众也。”<sup>[2]</sup>(P1748)“马汗之力”与“汗马之劳”同样，虽然有醒目的“马”字，但只是借“马”为喻，其实均用以形容军人们克服艰险付出的辛劳。

上古文献已见对劳作中身体现象“汗”的关注<sup>[27]</sup>。《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了奉汉武帝命“喻告巴蜀民”的文字内容。其中写道：“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讎。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sup>[2]</sup>(P3044)司马相如的生动文句，说到处于战争背景紧张局势之下的“边郡”军人，遇有敌情，则奋勇赴敌，“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其中“流汗”二字，读来平易，却是具体细致地形容了底层士卒的艰险苦难生活的。司马迁《史记》引录“流汗”文字，成为中国典籍文献中“流汗”一语出现最早的实例。这是史家保留的对于底层士兵在战争环境中生活场景和个人表现的极其真切的文化记忆<sup>[28]</sup>。

《淮南子·修务》追述上古圣王神农、尧、舜、禹、汤的业绩，称颂其成功：“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所谓“劳形尽虑”，是与本文讨论的主题相关的。《淮南子·修务》又写道：“奉一爵酒不知于色，挈一石之尊则白汗交流，又况赢天下之忧而任海内之事者乎？其重于尊亦远也！”所谓“奉一爵酒不知于色”，高诱注：“言其轻也。”而“挈一石之尊则白汗交流”，高诱注：“言其重也。”<sup>[29]</sup>(P1939-1940, 1947)形容劳任之“重”，言“白汗交流”。《淮南子》又有一处说到“汗”的文字，直接反映了劳动者的艰辛，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淮南子·精神》记述“繇者”辛苦劳作时流汗的情景，称之为“盐汗”：“今夫繇者，揭镬而负，负笼土，盐汗交流，喘息薄喉。当此之时，得休越下则脱然而喜矣。岩穴之间，非直越下之休也。”高诱注：“繇，役也。今河东谓治道为繇道。揭，举也。镬，斫也。负，铍也。青州谓之铍，有刃也。三辅谓之鋤也。笼，受土笼也。”对于“盐汗”，则有这样的解释：“白汗咸如盐，故曰盐汗也。”<sup>[29]</sup>(P783, 785-786)

理解所谓“今夫繇者，揭镬而负，负笼土”的劳作情形，可以参考《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言“臣虏之劳”之“身自持筑而负”，《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负笼荷镬”<sup>[8]</sup>(P4085)。前引《九章算术·商功》“土功筑作算程课”中关于“土功”的算题。类似内容言“沟”的挖掘，上文又有筑“城”“垣”“隄”的工程量测计的算题。这些工程形式，都是要“揭镬而负”的。《说文·手部》：“揭，高举也。”<sup>[4]</sup>(P603)而所谓“出土功”，是必须“高举”“镬而负”的。《淮南子》言“白汗”“盐汗”，是对重体力劳动者艰苦作业时身体情态的具体描述。这是比较早的对劳动史的真切记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谓“盐汗”，涉及皮肤排出液体含有盐分的知识，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关于农人耕作生活中流汗的情形，也为执政阶层所关注。汉哀帝初即位，李寻待诏黄门，为他讲述“治国”与“时禁”的关系，说道：“设上农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然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sup>[8]</sup>(P3188)农耕实践中常见的“农夫”“肉袒”“汗出”情景，出现在朝廷最高层议政言辞之中。

汉代人笔下说到下层社会生活有关“汗”文字，除了前引司马相如说军士表现：“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sup>[2]</sup>(P3045)此外，又有《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所见“鞞生虻虱，介冑被沾汗”<sup>[8]</sup>(P3560)。

以上有关文献信息中的史学记录，是中国史学文献中珍贵的劳动史遗存。这些文化迹象，既值得史学史研究者作为资料予以珍视，也可以为我们全面理解劳动史、劳作史和劳苦生活史提供有益的启示。

## 七、史书和出土文献所见劳动相关史料

秦汉劳动定额的历史记录，见于前引《九章算术》中的若干关于“程”的规定。“程”作为劳动定额，是讲究效率管理的行政史中重要的制度元素。甚至秦始皇本人也遵守这种“程”的设定。如前引《史记》卷

① 参见张守节《正义》篇：“筑，墙杵也。镬，锹也。《尔雅》云：‘锹谓之镬。’”<sup>[2]</sup>(P271, 272)



六《秦始皇本纪》所谓“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正如前引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所说,“《汉书·尹翁归传》等”所见“员程”,“《淮南子·说山》作员呈”。

我们曾经根据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的土方量、工期,参考《九章算术》有关挖土、运土、夯土的“程”,测算始皇陵复土工程的用工人数<sup>[20]</sup>。马克思重视“劳动组织”的意义。他曾经写道:“现代统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奴役,都同样是以现行的劳动组织为基础的,现代统治阶级当然要用它拥有的全部工具(其中之一就是现代国家机器)来维护和支持现行的劳动组织。”<sup>①</sup>[30](P126)<sup>[31]</sup>(P165)所谓“特权”和“奴役”以“劳动组织”为“基础”,在中国古代也可以发现相关迹象。前引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涉及“员程”的内容,有些体现奴隶劳动的组织方式<sup>②</sup>。而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的劳作者“授兵”,即成为有相当作战能力的军队,在章邯率领下成为秦王朝最后政治时段的主力部队,推知其工程管理方式,是以军事化形式组织劳役人员。这一情形,正好与汉代帝陵“复土”工程用“卒”,而工程指挥名号为“复土将军”一致<sup>[33]</sup>。

出土文献资料也有关于劳动史的信息。河西汉简多有戍卒从事辛苦劳作的记录。有些是体现了劳动强度的。如涉及“伐茭”“伐苇”“伐蒲”等劳作的简文,可见劳动量的记录。“……定作十七人伐苇五百□,率人伐卅,……”(133.21)又有涉及“伐蒲”的简例:“……率人伐八束,……”(161.11)以及“艾慈其”即“刈慈其”简例:“廿人艾慈其百束率人八束”(33.24)。原文应为“廿人艾慈其百六十束,率人八束”<sup>[34]</sup>。“除沙”“除土”劳作的载录,则说明工作强度是相当大的。简文:“三月甲辰卒十四人,其一人养,定作十三人,除沙三千七百七十石,率人除二百九十石。与此七万六千五百六十石。”(EPT51:117)具体的“除沙”工作量的记录,可以看作值得珍视的工程史料。“卒”“十三人”,“除沙三千七百七十石,率人除二百九十石。”简文有“三月甲辰”的日期标记,则“率人除二百九十石”,应该是当日劳作的人均工程量。西汉衡权每斤 248 克。以重量计,则“二百九十石”为 8630.4 公斤。东汉每斤 220 克<sup>[35]</sup>(P428-429)。则“二百九十石”为 7656 公斤。通过这一数据,可以得知戍卒以“省”的方式集中“除沙”的劳动强度<sup>[36]</sup>。

居延汉简“河渠卒河东皮氏毋忧里公乘杜建年廿五”(140.15)<sup>[37]</sup>(P232),“河渠卒”对照高清图版改释“治渠卒”,是合理的。即作:“治渠卒河东皮氏毋忧里公乘杜建年廿五”(140.15)<sup>[38]</sup>(P97)。“治渠卒”的基本劳作任务,是“治渠”,工程难度和劳作强度,也是可以估算的。

河西戍卒作为劳作者在当地生活劳作的日常感受,可以通过涉及“寒苦”的简文有所了解<sup>[39]</sup>。

## 八、行政史“劳”的考核:“功劳”制度与“积劳”形式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东巡碣石刻石写道:“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sup>[2]</sup>(P252)可知当时以“功劳”论“赏”行“恩”的政策,是实现行政公平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基点。秦代已经推行“积功劳”升迁的制度。赵高曾经说:“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sup>[2]</sup>(P268)起初,商鞅奖励“军功”的新法对于抑制宗室权益有积极意义。“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sup>[2]</sup>(P2230)这一制度对于在兵战战争中取胜自然有效,然而片面地绝对地崇尚“军功”,也曾经受到韩非的批评<sup>[40]</sup>(P907-908)。“功”的暂时表现与“劳”的长期表现结合,或许也是合理的。对于从政人员等级和待遇认定重视“劳”的这一制度,在汉代依然得以继承。

《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sup>[2]</sup>(P877)“劳”和“功”的概念,在这里有所说明。但是在实际操作时,“劳”是讲究“积日”的。居延汉简简文“肩水候官始安隧长公乘许宗中功一劳一岁十五日”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一文将这一内容置于“在文明社会人们的一切相互关系中,经济关系是原始的,具有决定性的关系”题下,应以为相关判断适用于“文明社会”的不同阶段。

② 李学勤指出:“近年有关秦的考古发现……特别是涉及奴隶制方面的,使我们感到必须重新描绘晚周到秦社会阶级结构的图景。”“睡虎地竹简秦律的发现和研究,展示了相当典型的奴隶制关系的景象”,“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笔者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sup>[32]</sup>(P290-291)。

(37.57)<sup>[41]</sup>(P122),所谓“中功一”和“劳一岁十五日”可以提供有关功劳制度的细节。《史记》卷一〇三《万石张叔列传》:“其官至孝文时,积功劳至大中大夫。”<sup>[2]</sup>(P2673)《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景帝时,(李)蔡积功劳至二千石。”<sup>[2]</sup>(P2873)均说“积功劳”。而《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则只说“积劳”:<sup>[2]</sup>(P3136)

“功”“劳”有内在关联。《史记》卷二《夏本纪》:“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sup>[2]</sup>(P51)即说积“劳”就“功”。《史记》卷三《殷本纪》:“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sup>[2]</sup>(P97)《说文·力部》:“功,以劳定国也。从力,工声。”段玉裁注:“《司勋》曰:‘国功曰功。’郑曰:‘保国家若伊尹。’许则举《祭法》文以释之也。《诗》:‘以奏肤公。’传曰:‘肤,犬也。公,功也。’此谓段公为功也。”<sup>[4]</sup>(P699)据《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发军“击宛”,分别封功。“奋行者官过其望,以适过行者皆绌其劳。”裴驷《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奋,迅。自乐入行者。”又引徐广曰:“奋行者及以适行者,虽俱有功劳,今行赏计其前有罪而减其赐,故曰‘绌其劳’也。绌,抑退也。此本以适行,故功劳不足重,所以绌降之,不得与奋行者齐赏之。”看来“劳”的计定,还有其他因素。而此次远征时日颇久,“伐宛再反,凡四岁而得罢焉”<sup>[2]</sup>(P3178)。这样说来,“以适行者”即“以谪行者”与“奋行者”即相当于志愿兵的积极从军者不同。他们的“劳”,遭遇“绌降”“抑退”。我们知道,李广利伐宛军中,有强制发配到远征军队里的“恶少年”<sup>①[42]</sup>他们与“奋行者”的待遇有一定区别,是可以理解的。

(本文的撰写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曾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泽、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周聪的帮助,谨此深致谢意。)

## 参考文献

- [1] 王子今. 中国传统文化的泛政治主义特色. 学术界, 1993, (1).
- [2] 史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 许慎. 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5] 后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6] 宋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7] 新唐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8] 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9] 王子今. 秦汉史学家的边政实践与边疆学认知.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3, (1).
- [10] 杨宝忠. 论衡校笺.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11] 陈寿. 三国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2] 王子今. 汉帝国交通地理的“直单于庭”方向.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0, (1).
- [13] 薛居正. 旧五代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4] 脱脱. 宋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5] 脱脱. 金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6] 宋濂. 元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7] 张廷玉. 明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8] 王子今. “周期率”辨疑. 百年潮, 2002, (3).
- [19] 林甘泉, 王子今. “其兴也浚”, “其亡也忽”: 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周期律//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20] 王子今. 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用工人数量论证. 文博, 1987, (1).
- [21] 晋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2] 南齐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①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后来,“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sup>[2]</sup>(P3174, 3176)

- [23] 旧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4]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25] 刘乐贤. 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 北京:天津出版社,1994.
- [26] 汇校九章算术.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郭书春汇校. 台北:台湾九章出版社,2004.
- [27] 王子今. 说《战国策》《淮南子》“白汗”“盐汗”——基于早期生理史、劳动史与盐史的认识. 人文杂志,2019,(5).
- [28] 王子今. 《史记》说“汗”. 月读,2020,(1).
- [29] 张双棣. 淮南子校释.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3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31] 黎澍,蒋大椿. 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32] 李学勤. 东周与秦代文明.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33] 王子今. 论“酈山徙”“授兵”:秦大型工程的军事化营作,秦汉研究,2022,(17).
- [34] 王子今. 汉代河西的“茭”——汉代植被史考察札记. 甘肃社会科学,2004,(5).
- [35] 丘光明. 中国历代度量衡考.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 [36] 王子今. 汉代河西戍卒的“除沙”劳作.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
- [37]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韶.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 [38] 简牍整理小组. 居延汉简(貳).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
- [39] 王子今. 汉代西北边塞吏卒的“寒苦”体验//简帛研究二〇一〇.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40] 韩非子集释. 陈奇猷校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41] 简牍整理小组. 居延汉简(壹).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4.
- [42] 王子今. 说秦汉“少年”与“恶少年”. 中国史研究,1991,(4).

## The Significance of Labor History: Historiographical Focus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Wang Zijin (Northwe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s been focused mostly on the life of the upper class,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political history. However, Sima Qian had "farming and herding" experience in his early years, so he paid much attention in *Shi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o "labor" in both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even commending the "industriousness" of ancient kings in governance. This historiographical approach has been occasionally found in subsequent historical works. Historiography resear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se aspects. Labor, toil, and arduous living conditions are the common facets of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continuous reflections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Focusing on the documentation, examination, appreci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phenomena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and social life history may be regarded as an indispensable perspective in historiographical studies. The misery of the working class was once seen as the cause of political crises and social unrest, and often led to popular uprisings. It should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pproach historical truth by avoiding the formulaic and simplistic explanations that summarize the history of the peasant wars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dynasties, and instead examining the toiling life at a broader social scal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natural disasters, administrative missteps, and war crises.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perspective; labor; work; toil; social life

■ 作者简介 王子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教授,陕西 西安 710069。

■ 责任编辑 桂 莉